

著名美籍华人作家
秦家骢 著
舒邈 曼予 译

FRANK
CHING

宗族之恋

ANCESTORS

900 Years in the Life of a Chinese Family



宗族之恋

一个中国家族的九百年繁衍史

(美) 秦家骢 著

舒逊 曼予 译

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京) 新登字 137 号

宗族之恋

(美) 秦家骢 著

舒逊 曼予 译

中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水利电力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印张:14 字数:280 千字

印数 1—3000 册

1993 年第 1 版 1993 年第 1 次印刷

ISBN 7-5071-0205-X/I·179

定价:9.20 元

作者介绍

秦家骢在1940年12月13日生于香港。当时因为日军侵华、他的父母南下避难。一年后，日军偷袭珍珠港，秦随父母迁回上海，在沪居住四年。二次大战结束后国内战争爆发，秦又随家逃难到香港。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性胜利，秦家仍滞留国外。秦家骢早年曾从意大利修女与爱尔兰天主教教士学习。他毕业于福达姆大学，后入哥伦比亚大学为福特基金会研究生，取得高级国际新闻采访专业证书。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他在《纽约时报》国外新闻部任中国地区专家。1979年，受《华尔街日报》社派遣到中国建立驻京办事处。1983年辞去该职从事本书写作。

目 录

引言 寻访九百年前的祖宗陵寝	1
第一章 秦观：浪漫诗人	21
第二章 秦观：屡遭贬谪的失意人	39
第三章 秦桧：秦氏家族中的叛徒？	53
第四章 秦裕伯：上海的城隍	63
第五章 秦维桢：秦氏家族坚实的根	75
第六章 秦旭：碧山竹炉的故事	85
第七章 秦氏门中的孝子	97
第八章 秦金：学士与战略家	109
第九章 秦金：“端敏”尚书	123
第十章 秦梁：梦中预言的应验	137
第十一章 秦耀：济世英雄	149
第十二章 秦镛：明末孤臣与哲人	163
第十三章 秦德藻：我父母的共同祖先	177
第十四章 秦松龄：最年轻的翰林	189
第十五章 秦松龄：康熙皇帝的起居注官	203
第十六章 秦道然：皇九子的师傅	213

第十七章	秦道然：政治犯	225
第十八章	秦蕙田：探花	239
第十九章	秦蕙田：刑部尚书	255
第二十章	秦震均：平叛的一时之荣	271
第二十一章	秦瀛：扫荡海寇的按察使	291
第二十二章	秦瀛：京都大吏	307
第二十三章	秦湘业：荣登副榜	321
第二十四章	我的祖父：知县秦国钧	341
第二十五章	我的父亲：法律界先驱秦联奎	365
第二十六章	我的母亲：昭华的于归	389
第二十七章	我的哥哥：共产党烈士秦家骏	411
第二十八章	父亲：他的晚年	421

引言

寻访九百年前的祖宗陵寝

我最早的童年记忆是1946年我五岁时的夏天。那时我们全家去香港避难。我在一艘驶过南中国海的客轮上，透过舷窗向外眺望。

我是在香港长大的。中国儿童大都成长在祖父母、叔伯姑婶、堂表兄弟等家族亲属的环境之中；而我却离乡背井，游离于他们之外。我父亲有三房妻室，我母亲一房的儿女当时住在香港，而我父亲的其他子女则留在内地。所以一直到我长大以后很久，我都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兄弟姊妹。

我父亲秦联奎，生于1888年，即光绪十四年，比毛泽东大五岁，比蒋介石小一岁。他成长在政治、社会动荡时期，正处于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覆灭，被一个软弱、不稳定的共和政体所取代的时候。他在二十几岁时便娶了一个苏州姑娘曹月恒。他俩带大了六个孩子，三男三女。

多妻是相当普遍的事。所以在他和他的苏州美人结合之后，他又娶了一房妻室，叫许佩华，是他以前的塾师之妹。在订聘前，他的一个姐姐曾经代表男家相亲，认为她“颇有姿色”。但婚礼过后，当他掀起新娘的盖头时，却看见一个长了一对小眯缝眼的容貌平庸的女人。不久，他便又回到他初恋的美人那边，而他的夫人只好独守空房了。

到我父亲和我母亲结婚的时候，他早年的两个妻子都已故去了，照中国的说法这叫“填房”。由于父亲早年的子女和我母亲的年龄不相上下，他们大都不和我们住在一起。因此当我在香港长大时，我只认识我母亲生的其他子女和我父亲前妻的最小的孩子。

我上的是一所罗马天主教的教会学校。和香港其他这类学校一样，这所学校的目标是把中国孩子培养成英国绅士。我们手里摇的是英国国旗，心里仰慕的是大英帝国的荣耀，学着计算的是英镑、先令、便士。当中国的孩子们受着与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残余进行阶级斗争的教育时，我却在中国的大门口、在作为自由资本主义的最后前哨阵地之一的英国殖民地上，学习着西方的生活方式。

到我十二岁的时候，我的世界已经缩小到三个人的生活圈子里：一个生病、爱吵架而我叫他做父亲的老人；一个他经常与之拌嘴而比他年轻很多、性格刚强的女人——我的母亲和与我年龄最接近的姐姐秦家德。我是最小的，母亲生我的时候，父亲已经五十多岁了。当时我还不了解，就是这个怪癖的老人曾经是中国宪法的一位设计师。他曾经为了坚持自己的原则而宁愿选择了贫困与流亡的生活之路。1949年，在中国陷入分裂的前夕，他决定既不拥护蒋介石的国民党，也不拥护毛泽东的共产党，宁愿关闭了他在上海的律师事务所，自动流亡到香港与家人团聚。

我父亲在香港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他不能从事英国的法律事务，病情日益加重，性格日益怪癖。我们住在一个比较好的地区，住在一幢三层楼房的租赁房屋里，与另一家合用一个厨房。我们安装了一套抽水马桶，可是我还清楚地记得运粪工人的吆喝声。他们每晚都来收集邻居厕所中

的粪便。我们的邻居和香港的大多数居民一样讲广东话，而我只会讲上海话。我虽然出生在香港，可却没有一种归属感。这种异域的感觉因我们家的日益贫困而加重着。我们学校允许家境贫寒的学生少交一些学费。学费是每月缴纳的，每个孩子所交数目由教师向全班宣布。我的名字总是排在最后几名，因为我比别的孩子交的少。

我渴望舒适、安全和我从未体会过的故土乡情。当时我并不自觉，实际上我早已开始了我这长达几十年的对我们家族历史细节的探索。只是在若干年以后，我才理解这是一种遵循中国最优秀传统文化的行为。因为在中国人之间，一个最苛刻的评语就是说某一个人“忘本”。

我十九岁离开香港到美国，但在我的新居中，同样的异域感在时刻侵袭着我。我知道驱走这种魔障的唯一办法是投入我的过去，而我的过去埋藏在中国的大地上。

到了七十年代初期，中美关系解冻，我才决定回到中国与那些不知名的、在许多情况下我并不知道他们存在的亲属相认。

我到渥太华新建的中国使馆去请求签证，尽管我是申请以私人身份入境的，但由于当时我在《纽约时报》国外新闻部工作，因而使馆以怀疑的眼光看待我的申请。他们告诉我这项申请需要北京外交部批准。后来，我飞到香港向中国大陆政府在港代理机构中国旅行社陈述。我提出我有作为“同胞”访华的权利。因为我出生在香港，而照中国的看法，尽管香港由英国管理，它仍是中国领土。同胞就和外国人不一样，不需办入境签证，因为从理论上说，他们不过是从国土上的一处迁到另一处而已。经过几度交涉，我的申请得到了批准。我得到了一份“回乡介绍信”。

1973年8月1日，我登上了一列经香港边界罗湖镇开往中国的老式柴油火车。这一年我三十二岁。平静沉稳、穿戴讲究的男男女女、外国人和华侨上了头等车厢。因为我是中国同胞，中国旅行社把我安排在三等车厢里。这里的男男女女上车时推推搡搡，把行李和孩子从窗口递进去，常常是自己也跟着爬进去，因为狭窄的车厢口已经挤死了。许多人挑着担子，里边装着活鸡、食品篮和送给境内亲属的其他礼品。车厢里连站着的地方也很少，我从人群中挤进去，在车厢的最下一级阶梯上站住脚，紧紧抓住了把手，以免掉下去。就这样我被隆隆的火车缓慢地拖向中国。

在边境，我们跨过了一个将英国统治的香港与中国共产党统治的大陆分割开的破木桥，一边飘扬着英国国旗，另一边飘扬着中国的五星红旗。跨过这座桥之后，所有乘客都被带到一间大棚屋里接受移民与海关官员的查询。

对我进行盘问的人不厌其烦地问了我的背景、我的工作、我的亲属和朋友。他让我掏出口袋里所有的东西。我的一个口袋里装了我在香港遇到的几个人的名片。盘问我的人对所有这些人都异常关切。他也问到我的父母以及我的兄弟姐妹。他把我的回答全都记了下来。然后他又从头再问了一遍，同样的问题以不同方式提问。这次盘问进行了一个多小时。

最后他终于认定我不会对中国的安全构成什么直接威胁，允许我通过了海关。但我带的一些香港报纸却被没收了。

和我从香港到边境比较，到广州的旅程是愉快的。这是一列中国唯一装有空调的火车。它行驶于深圳与广州之间，为外国人乘坐而设。我坐在软座上，浏览着广东省的绿色田

野滚滚而过。扩音器在播放着“东方红”的曲调。这首歌颂毛泽东的歌曲在文化革命中实际上代替了中国的国歌。

最后，当火车驶进广州车站时，扩音器里传出了感谢乘客们协助本次列车工作人员胜利完成了他们的任务等话语。

香港中国旅行社曾建议我住广州华侨饭店，可是接待柜台后面的那位年轻妇女告诉我这里已经客满，而且拒绝把我介绍到另一家旅馆去。“香港同胞一般都住在亲戚家里，”她说，“我们只接待国外华侨。”我一下子窘在那里了。我是以同胞身份入境的，而正因如此，却使我住不进旅馆。我如果坦白告诉她我实际上是从纽约来的，又恐怕造成什么麻烦。但我别无选择。于是我拿出了我的美籍身份证明，并且向她解释说，我虽然是香港同胞，但是住在美国。接待员的态度一下子就变了。她说不但有房间，而且可以选择。最好的每天十美元，有浴室、电话和电扇。我住下了。

第二天，我怀着急切的期待登上了飞往上海的飞机，从那里，我将开始寻找失散已久的亲属。

我有我舅舅秦开华的地址。我和他没有见过面。他和我母亲的关系从来不十分密切。他曾经反对过我父母的婚姻，因为他俩是远亲。但在1973年，这个舅舅是我和国内全部亲属的唯一联络点。我从街面上买的地图上找到了他的地址，为避免招摇便决定步行到那里。到门口我轻轻地叩打了房门，免得引起邻居们的疑虑。一个只穿着背心裤衩的瘦削老人出现在我面前，原来这就是我的舅父。我说明我是昭华的儿子秦家骢，他把我让进屋里。我穿过一间摆了一张木床的阴暗屋子走进一间小起居室。当时正值盛暑，天气十分炎热。我们面对面落座以后，谁都想不起该说什么来。

最后，舅舅打开了电扇，直冲着我扇起风来，他自己则用一把老式的蒲扇扇着。他把我介绍给他的妻子和他们的十六岁的女儿。

在这些陌生人面前我却有一种回到家里的感觉。我对他们讲了国外亲属以及他们各自的工作等情况。告别以前，我邀请他们次日晚上到我的饭店去吃晚饭。

第二天，我接到接待员的电话说有客人在大厅等我。我下楼以后发现我的亲属和接待人员正在争辩着：饭店要求他们每人都要交验身份证，并且要填写一张三联单，说明他们的姓名、地址、工作单位，以及与被访者的关系。在办完这些手续之后才允许他们上电梯到餐厅去。晚饭后，我请他们到我的房间去坐，开电梯的拒绝让他们上去，说他们没有经过许可不能上去。在大厅里，接待人员告诉我们说只有旅客的父母和子女才许进入房间，其他客人只能在大厅接待。几经交涉，又填了一张表格，我的亲属才被特许上楼。不用说，从此以后他们再也不来看我了。

但是，他们在自己家里欢迎了我。我每天晚上都和我舅父、舅母在一起。从他们那里我了解了许多关于中国和我们家族的事，都是我做梦也没想到的。

在离开上海之前，我给我舅母买了一份生日礼物。我去了友谊商店，那是只对外国人开放的。我买了一只中国的名牌手表送给她。我也送给我舅父一些我带来的小礼品。他回敬给我一只玉兔。这是他祖父传下来、由他保留至今的几件东西之一。玉，对中国人来说比其他宝石珍贵。一般人认为玉是避邪之宝。舅父送给我这个玉兔，在一定意义上是把他自己的一部分交给了我。

我从上海北上到北京。这两个城市形成十分鲜明的对

比。上海是使人感到压抑的，只剩下了繁华大都市的一个空壳。在经过四分之一世纪的忽视之后，原来那些西方式建筑已经逐渐倾圮了。北京是壮丽的，长城蜿蜒在城北，广阔的天安门广场位于城市中心。在文化革命初期，毛主席在这里检阅了数以百万计的红卫兵；长安街这条建于十五世纪明代大街，其宽阔足以容纳十条交通甬道。整个城市都给人以一种历史感，它是一个古老但仍然生机勃勃的文明中心。

这次中国之行虽然短暂却使我兴奋不已：它标志着我多年向往和梦想的实现。我通过此行所了解到关于祖国的知识，比我通过多年阅读所得到的知识要多得多。更重要的是此行使我产生了急于填补我对家族了解上的空白的使命感。

到第二年，即1974年7月，我又一次访问了中国。这次我参加了一个香港旅行团，在毗邻香港的广东省停留了一个星期，访问了广州、佛山和中国领导人常常去的夕照温泉。

一周之后，旅行团回香港，我则去上海探望舅父一家。我发了一封电报告诉舅父我将到达，但由于不习惯发中文电报，忘了填写发报人姓名。当我那天晚上登门时，他露出出乎意料的神情。

“噢，是你呀，”他说，“我以为是母亲呢。”我感到他有些失望。

尽管他俩有些嫌隙，可是我母亲多年对他的心意软化了他。他渴望能再和她见上一面。所以那封未署名的电报到达后，他便费了很多心思，买来酒、鸡和其他难以买到的食品，准备举行一次家宴庆祝他们的团聚。

吃过晚饭，我提议和他下一盘棋。我知道他是爱下棋

的。下完一局之后，他靠在椅背上瞧着他的妻子，略带着几分感慨地说：“我做梦也没想到昭华的儿子会来和我一起下棋。”

舅父和我母亲再见一面的愿望终于没有实现。次年舅母写信告诉我，他因肝病逝世。在失去了我和故土的这一联系之后，我急于要找到生活在中国的异母兄长，便向住在台湾的异母姐姐家娟探询。当年我们迁到香港时，她还留在大陆。她给了我一个叫毛训询的上海人的地址，说可以写信问他。我给毛先生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是谁，等了几个月也没回信。过了一年我才知道这个人已经死了，他的妻子则一无所知。

1976年1月，周总理在长期患癌症之后逝世。他的逝世使全国陷入悲痛绝望之中，终于在1976年4月爆发了天安门事件。五个月之后毛主席去世，几周后，他的妻子和政治同僚以组织了“四人帮”篡夺权力罪名被捕入狱。

此时，我已从纽约调到香港。我作为《亚洲华尔街日报》记者经常访问中国。因为工作关系，我得以随时访问大陆和台湾。到1978年，我去了一趟台湾向家娟和她的丈夫品衡话别，他们已决定移民到澳大利亚去和女儿团聚。他们的女儿已嫁给了澳大利亚的一家餐厅老板。

一天晚饭后，家娟拿了一个装满旧书的大塑料口袋从后屋里走出来，一面交给我一面说：“我保存的时间不短了，该是交给你这个儿子的时候了。”

口袋里装的是父亲1959年去世时留下的一部分书和文件，是他少量遗物中的一部分。由家娟收存了二十年。我小心地打开了塑料袋，注意到里边的三本书，其中两本是印有父亲作为国民大会代表的姓名和照片的国民政府官方刊物。

第三本是老式的宣纸印刷的线装书，封面印的书名是《锡山秦氏宗谱》。

我拿的这本线装书记载了我家三十三代祖先的名讳，延编九百年，上溯到十一世纪的秦观。我父亲和我母亲出于同族，都是这位宋代著名大诗人的后裔。从我父亲这边计算，由秦观到我共传了三十三代，而从我母亲这边计算，是三十四代。

当这些无锡秦氏家族档案材料交到我手里的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在今天，这些本册该是多么珍贵。不久，我才发现，即使在过去的年代里，也只有名门望族才有历代宗谱传交下来。

宗谱卷本给本族成员灌注以家族为荣的心态。如果家族出一大富大贵的人，这个家族亲属便都能蒙荫受惠；同样，如一人遭难，全族都要受到牵连。

过去曾有因一人获罪而全族受戮之事。最重者，则遭到诛九族的严惩。即诛其本人、父、祖、曾祖、高祖，子、孙、曾孙、玄孙，并株连本门兄弟姊妹以及配偶、后裔。这种诛戮，即灭其太曾祖以下的满门大小。清初学士庄廷琨修《明史辑略》，中多触讳之语，忤于朝廷，遂成大狱，时廷琨本人已前死，发墓焚其骨，诛其全家并且牵涉了其他学士的家族。凡印制此书和购买此书者俱斩。牵连而死者七十余人，其余被发配边疆。

中国大多数人和西方人一样只知其亲生父、祖等直系长辈。保存家谱的很少有能追溯到二三百年以上的。

修宗谱是需要做很多组织工作的。每个家庭都需记录其男性成员的生卒年月。女性成员的生年在册，但因女儿不能传宗接代，故记载简略。在我家的家谱里记有女儿的名字

及其出嫁的人家，但不像男人那样记录其生平。唯一例外是关于“节妇”的记载，一般均为早年丧夫，或甚至婚前丧夫，尽其余生孝敬父母的孀妇。

本族各家为宗谱提供生卒婚嫁的记录，而生平事迹一般都是相当简略的。其中包括：名，为某某之子；字（自取名，一般反映其本人的志趣）；官阶、作为、著作；生卒年月日；妻室姓名，为某某之女，籍贯，生卒年月日；子女取名以及葬于何地。

录入宗谱的男子意味着已被本族接受为其中一员，至于被认为有辱家族的人则被除籍。一个有趣的事例是秦期。他是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组织者之一，也是在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共大屠杀时，在无锡处决的七人中最重要的一人。他的首级被割下来挂在城墙上，用以恫吓群众，不得参加共产党。由于他的名字没有列入家谱，所以我不清楚我和他是什么样的亲属关系，而我家家谱的最后修订仅在他死后的一二年。下令处决秦期的却是秦毓璠，也是秦氏家族的一员。他是国民党的要员，曾经追随孙中山组织过反清运动。

潜心修谱不仅反映一种家族的自豪感，也反映对中国文化与文明的一种自豪感。在十九世纪，当中国一再遭受西方列强的欺凌，大部分国土遭受欧洲各国的分割、成为它们的势力范围时，中国人民的自豪感也就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在他们的国家如此落后这些昭然的证据之下，中国人从盲目自满之中觉醒了。许多具有革新思想的人转而求助于西方的科学、民主思想，来医治中国的病症创伤，传统的价值观念被抛弃了，修辑家史遂被认为是一种封建主义的残余。1949年，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这种古老的作法几乎

消亡殆尽了。

许多保存在私人手里的家谱，在文化革命中散失了。年轻的红卫兵在毛主席的“除四旧”——旧文化、旧习惯、旧风俗和旧思想——的号召下把他们认为是原剥削阶级的残余物品一概付之一炬。许多人因为怕遭到迫害而把祖传的卷宗销毁了。这些损失不论对个人还是对国家都是无法衡量的。西方的藏书家在三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曾经搜集到许多这类宗卷，所以今天美国有名的大学都藏有相当数量的中国宗谱，其中有一些已在中国找不到了。

我们有许多家史材料也因文化革命而销毁或散失了。一些族人因为害怕狂热的红卫兵发现他们保留的祖先照片和家谱材料就自行焚烧了。但有一位亲属冒着遭受迫害的危险保存了几页详列本族近代宗族情况的材料。我就是从他那里得到了我父亲和我祖父的族谱。我的祖母著有两卷诗文，她的所有子女都存有抄本。文化革命之后，除去其中的一卷保存下来成为孤本之外，其它都散失了。这个孤本就是我这个堂兄避开红卫兵珍藏下来的，后来他热情割爱，送给了我。

1978年12月15日美国宣布承认北京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并决定撤消对台北的国民党政府在外交上的承认。

我和其他十几名大都以香港为基地的美国记者一起，在该年12月份飞往北京，报道中美正式建交的新闻。过了五个月，中国允许四家美国报纸——《华尔街日报》、《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洛杉矶时报》——开设办事处。我被《华尔街日报》选派为驻华记者。

我在1979年6月飞到北京，在一个有十八层楼的现代化饭店——北京饭店——的一个房间里设立了《华尔街日报》